

张艳丽◎著

嘉道时期的

JiaDaoShiQiDeZaiHuangYuSheHui

灾荒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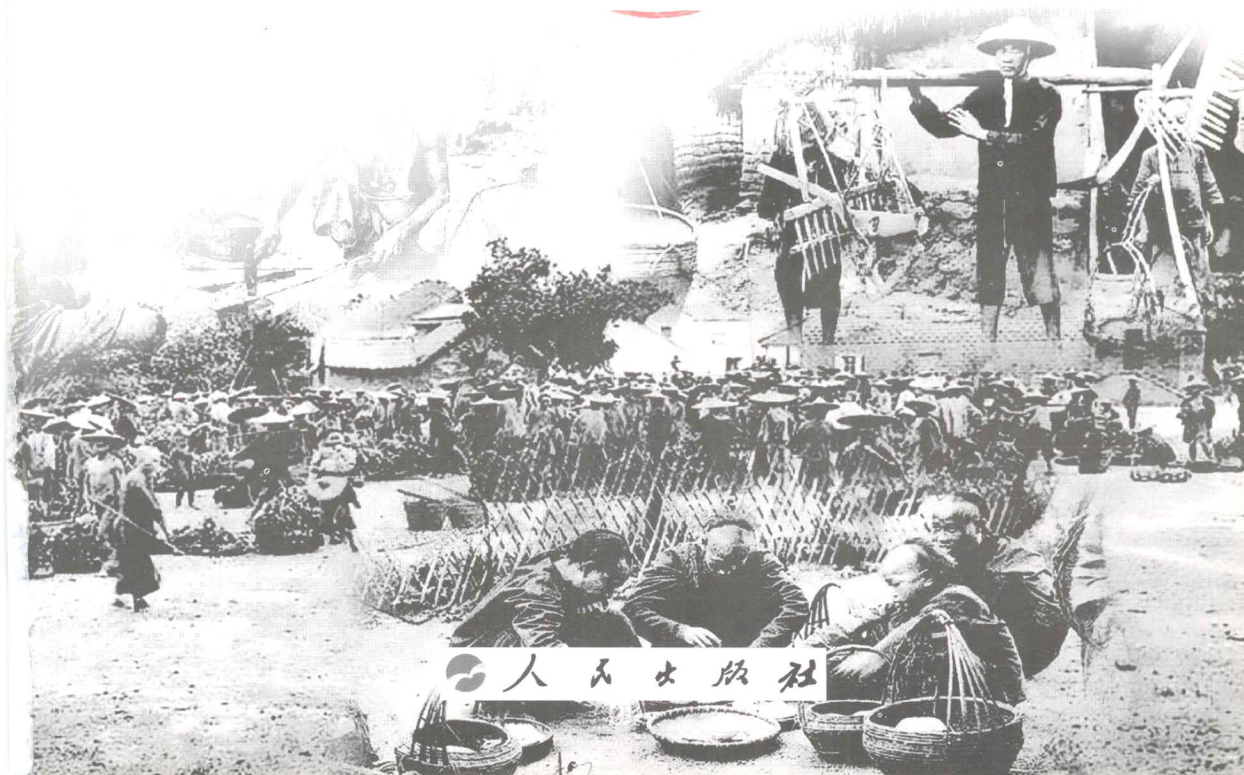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张艳丽◎著

嘉道时期的

JiaDaoShiQiDeZaiHuangYuSheHui

灾荒与社会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装帧设计:吕 龙

版式设计:胡继红

责任校对:马 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张艳丽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1-007105-3

I. 嘉… II. 张… III. 自然灾害-史料-中国-清代

IV. X43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6714 号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JIADAO SHIJI DE ZAIHUANG YU SHEHUI

张艳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22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105-3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李文海

张艳丽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写出的学术专著《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当然义不容辞，因为从选题到构思到写作，我同艳丽同志有过几次讨论，也算同这部书有着不解缘分。

拿到这部书稿的清样，正好是汶川大地震过了整整一个月。这个时候，人们因这场大灾巨祸引起的震惊、悲恸、焦虑、感奋的强烈感情冲击远未过去，余震依然不断地随时发生，地震灾区的抗灾斗争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重读书稿，不由得从历史到现实，对有关自然灾害的方方面面，对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产生若干联想，寻求历史的启示。

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一刻起，一个月来，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与感动。悲伤，为着那么多不幸罹难的宝贵生命，为着更多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创伤的幸存者，为着无数失去了亲人、破碎了家园的父老乡亲。感动，则是为了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用身体护翼着幼弱生命的老师和父母，为了那些因救护学生而重新冲入摇晃着的教学楼而以身殉职的师长，为了那些全力抢救别人却舍弃了自己亲人的无私的人，为了那些被埋十几、几十甚至百余小时凭着勇敢和坚强终于使死神望而却步的强者，为了冒着连续不断的余震危险从四面八方自动汇集的志愿者，为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抗震救灾的各级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子弟兵，为了所有用各种方式献出一颗炽热爱心的人们。这场地震，极大地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昂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据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邓拓先生统计，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公元前206年起计算，到1936年止，共计2142年间达到5150次，平均约每4个月强便有一次。另有学

者通过统计成灾州县数测算了受灾的广度。据估算, 1644 至 1839 年间成灾州县共 28938 州县/次, 年均约 148 州县/次。进入近代后, 为数更巨, 如 1860 至 1895 年间总数为 17278 州县/次, 年均约 493 州县/次; 1912 至 1948 年间共 16698 州县/次, 年均约 451 州县/次, 这意味着此时每年都有近 1/4 的国土笼罩在灾荒的阴霾之下。

我国处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地震带即环太平洋构造带和欧亚构造带的夹持之中, 使我国成为震多、震强、震频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地震目录统计》, 截至 1949 年, 我国发生的 4.75 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645 次。地震造成的对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更是骇人听闻。1556 年 1 月 23 日, 发生了以陕西华县为震中的 8.25 级大地震, 祸及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 至少有 83 万多人罹难, 是世界地震史上迄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而仅在 1840 至 1949 年间, 我国即发生 7 级以上地震 64 次, 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共 27 次。其中, 1879 年甘肃武都、1902 年新疆阿图什、1906 年新疆沙湾、1920 年甘肃海原 (今属宁夏)、1927 年甘肃古浪、1931 年新疆富蕴等处为震中的大地震, 震级皆在里氏 8 级或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影响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情形。正如本书的《绪论》所说: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社会抗灾、防灾的能力大大增强。”但是, 并不是说从此以后, 自然灾害已经不再对我们构成重大威胁了, 事实上, “经济发展的同时, 由于某些方面处理不当, 也带来一些问题, 新的灾害种类如环境污染、水污染等凸现, 自然灾害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势头。灾害种类愈益增多, 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愈益增大, 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1998 年的全国性大水灾, 2003 年的“非典”流行, 以及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 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 突发性的严重自然灾害, 仍然是戕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 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障碍。我们不仅要提高对政治性、社会性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的警惕, 同时还要加强对由自然原因造成严重灾害的预防和对策研究。在全社会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 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民族灾难, 既包括社会的, 也包括自然的。但不论哪一种灾难, 都没有把我们的民族压倒, 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屈服。相反, 灾难锤炼了我们的民族意志, 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我们的国家、民族正是在克服各种巨大灾难中不断奋起, 不断前进。正如江泽民同

志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泽民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正因为我们国家自然灾害频繁而众多，所以我国人民也就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的宝贵经验。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它既包括在天人关系及灾荒观方面的某些带有科学性的认识，也体现在政治设施方面相对完整严密的救荒机制，更反映在人民群众生动具体的救灾实践，以及记录和总结这些实践的种类繁多的荒政著作之中。本书虽然主要研究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情况，但对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分析和阐述。

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人们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在大体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异。本书具体描述了在清代封建政治统治下救灾、赈灾中的种种弊端，把这个历史情况同今天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现实相对比，就让人更加明白地看清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看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如果没有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迅速发展的科技力量的有力保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果没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对于干部、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武装，要取得今天这样抗震救灾的初步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这次抗震救灾的斗争，人们把科学发展观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看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党中央到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

近年来，灾荒史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也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同社会的现实需要相比，这一学科还有着广阔的发展余地，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是一个紧迫的时代任务。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术工作者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我们也希望，张艳丽同志在现有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个领域作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2008年6月14日晨于世纪城时雨园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灾害的发生,影响因素很多,在较长的时间段上考察灾害发生的状况,对揭示灾害发生的规律非常重要,因此,灾荒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上保存的丰富的灾害史资料为我们进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条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度,历代统治者从维护政权的角度也历来强调重农,进而关注对农业有较大影响的灾害的治理工作。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灾害的记载,它们散见于历代典籍中,仅以所谓的“正史”而言,《汉书》设“五行志”专篇记载灾异,此后,一直到《清史稿》,基本上没有间断,保存下来的资料内容丰富而且年代久远。其他更加具体、翔实的资料,保存在方志、实录、档案、农书、文集、日记、书信、诗词等文献中,这些历史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确切而生动的史实根据。

清王朝是离我们最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在清史研究中,嘉道时期是目前史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一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历史断代分期的影响。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主要侧重对康乾以前的研究,对嘉道两朝只是稍有提及,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则一般把研究的重点选在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道光后期,相对忽视了对嘉道时期的研究。但是这并不代表嘉道时期是个无关紧要的时期。正确地把握嘉道时期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清王朝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历史形成更明晰的认识。

嘉道时期,自然灾害不断。清中叶以后,人口骤增,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必然形成危机,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导致灾害的频发。嘉道时期灾荒普遍而频繁的发生,也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防灾、抗灾能力较为薄弱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嘉道时期清政府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理灾患的社会对策,形似严格周密的救荒体制往往成为一纸空文,从而更加剧了灾害的发生,引发了更严重的社会危机。自然灾害不仅对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往往导致社会矛盾的

尖锐和激化。历史上每一次农民战争的发生都与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灾荒引起的黎民百姓的生存危机,致使他们铤而走险,走上反抗官府的道路。透过政府救荒的机制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因此,探讨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还可以增添一个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全新视角。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联系,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

嘉道时期的灾荒史研究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抗灾、防灾的能力大大增强。但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某些方面处理不当,也带来一些问题,新的灾害种类如环境污染、水污染等凸现,自然灾害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势头。灾害种类愈益增多,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愈益增大,灾害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加强灾荒史研究,探讨灾害发生的规律,分析历史上救灾措施的成败利弊,为我们今天的防灾减灾救灾活动提供历史借鉴显得极为重要。

特别是,近年来,特大灾害仍时有发生。1998年夏的全国性洪涝灾害,2003年春夏的“非典”流行,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大海啸,2007年末南方数省大雪灾……这一桩桩惊心动魄的突发性灾难,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

当前社会发展对人和自然提出的更高要求促使我们要加强灾害史的研究,也为灾害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胡锦涛同志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的新理念,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8年环境保护部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而这些,正是灾害史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学术和现实意义角度出发,笔者初步确立了嘉道时期灾荒研究这样一个选题。

二、学术史的回顾

在历史研究中,灾荒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地位。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江淮大洪水的爆发,灾荒史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进行灾荒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期)书中对中国远古传说和殷商时代至民国时期的灾荒实况和灾荒的成因进行了梳理,介绍了历代的救荒思想和救荒政策,基本上奠定了今后灾荒史研究的格局和框架。此外,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1993年影印版)和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版)主要介绍了从上古到明清,有关民食的政策,常平仓、社仓、义仓的起源、具体的运作方法、组织程序以及兴废之沿革,从保护民食的角度论述了备荒赈灾的主要措施。陈高儒《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9年版)对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进行了简单的统计。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正常的研究进程被打断,整个灾荒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国家水利事业和经济建设区域规划的需要,自然科学工作者通过对正史、别史、笔记、方志、档案、诗文集、杂录等古籍的整理,对中国历代各地各类灾荒史料或旱涝等历史气候资料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系统地研究和揭示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五百年来旱涝地震等各类灾害的演变趋势、自然成因以及影响,提出了灾害的防治对策。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成就相比,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灾荒史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落后。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灾荒史研究成果几乎一片空白。八十年代,李文海先生率先成立“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带动了一批研究者专门从事该领域的研究,灾荒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八十年代以后,灾荒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和《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采用编年体形式对近代灾荒发生情况进行逐

年叙述,史料参考价值很高。其他著作如: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文海、程献、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宗晋、郑功成主编的《中国灾害研究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高建国《中国减灾史话》(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李向军《清代灾荒研究》是论述清代荒政的专著,从救荒的基本程序、救荒备荒措施、荒政与财政、荒政与吏治等方面对清代1840年之前的荒政进行了总体论述,认为“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嘉道以后荒政出现诸多弊端,成效不如清代前期。在清代灾荒史研究中,灾荒史研究成果康雍乾时期较多。法国学者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1743至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作者同时也提出大规模的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以后越来越难以实行。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以及商业力量,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相当多的地方政府陷入混乱,大规模的国家赈济更是难以实行。其他相关文章还很多,如张天周《乾隆防灾救荒论》(《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对乾隆防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考察,认为强调超前做好赈灾准备是乾隆抓荒政建设的突出表现。杨振蛟《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认为蠲免政策是皇权政治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张祥稳《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郑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通过个案分析认为,乾隆时期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但赈济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李文海《〈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荒政书角度对乾隆时期荒政进行探讨,既肯定了该书倡导的灾荒观的积极意义,又实事求是的指出该书存在的历史局限。近代时期的灾荒史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近代时期最惨烈的大灾荒是“丁戊奇荒”,学者对此研究较多。如赵矢元《丁戊奇荒述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2期)、王金香《山西“丁戊奇荒”略探》(《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夏明方《也谈“丁戊奇荒”》(《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和《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等。其中夏明方对“丁戊奇荒”的研究最为着力,他

对此次灾荒中出现的三种赈济形式，即官赈、义赈和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都给予了比较仔细的论述。洋务派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传统荒政的近代化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对此给予重视，如夏明方《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和《洋务思潮中的荒政近代化构想及其历史地位》（《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2期）等文章对此多有论述。也有学者对洋务派重要人物的救灾活动进行论述，如卢世菊《张之洞赈荒述评》（《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张之洞作为注重实事的洋务大臣，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灾后应急的荒政措施，同时更着眼于标本兼治，把救灾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以及改善交通等相结合，使得赈荒更具有积极性和进步性。传教士在近代荒政中的作用也有学者论及，如夏明方《论1876至1879年西方新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指出参与救荒使得西方的传教事业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对中国绅商发起的义赈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具体分析了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以及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论述了晚清政权的防灾、救灾机制，讨论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叙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晚清政局产生的一些重大影响。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指出自然灾害的群发性正是当时天、地、生、人交相作用的结果，是天体异常、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对灾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嘉道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然而，史学界对它的研究程度不能与其地位相匹配，显得较为薄弱。嘉庆朝的历史在清代史著作中一般只是稍有提及，道光朝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以鸦片战争为中心而展开，系统、全面研究嘉道时期灾荒的专著目前还付阙如。研究嘉道两朝的专著对这一时期的荒政有所涉及。朱诚如主编的《清朝通史》（嘉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七部分第一节论述治理黄河问题，认为嘉庆朝治理黄河仍停留在灾后防治的被动措施上。《清朝通史》（道光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对道光朝治河有所提及。关文发《嘉庆帝》（吉林文史出版，1993年版）第四章论述以“安民制乱”为主旨的内政诸措施中，对治河、赈灾与蠲免问题有所论述，认为嘉庆帝对治河、救灾进行过一定的努力，但是嘉庆帝的消极和过于保守及整个河务官员队伍的素质低下限制了实施的成效。冯士铎、于铎铭《道光传》（辽宁教育出版

社, 1992 年版) 第三章第二节论述防灾恤民恢复生产问题, 提出由于道光时期吏治败坏, 导致赈灾收效微乎其微。

论述嘉道时期灾荒的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其中有些文章对水灾进行论述。如: 骆腾《清嘉道两朝河决考》(《水利》, 1936 年 5 月) 对清代的黄河泛滥情况进行了考察。罗尔纲《道光末年的灾荒》(《益世报·史学》第 29 期, 1936 年 5 月 24 日) 对道光末年的灾荒进行了考察。彭雨新《鸦片战争前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江汉论坛》, 1984 年第 6 期) 一文认为, 治水是苏松地方官在重赋难以豁免, 灾蠲又无济于实际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较之有名无实的减赋政策远胜一筹。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清史研究通讯》, 1989 年第 2 期) 认为由于受灾地区大都离鸦片战争的战区不远, 因此, 严重的自然灾害, 给战祸造成的社会动荡更增添了几分动荡不安。世博、伯钧《道光朝的水灾及有关问题》(《历史教学》, 1989 年第 9 期) 认为水灾是道光朝的大患, 道光对水灾进行了认真防治, 但收效甚微, 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王质彬、王笑凌《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清史研究通讯》, 1990 年第 2 期) 认为进入嘉庆以后, 决溢泛滥频繁, 道光年间, 情况依然相当严重。河道淤积、用人不当、墨守陈规、贪污浪费等弊端是黄河决溢严重的原因。郑师渠《论道光朝河政》(《历史档案》, 1996 年第 2 期) 认为道光朝河政颓坏, 既是清朝统治衰朽的必然结果, 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此种衰朽的过程。它严重消耗了清廷的财力, 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从根本上削弱了清朝统治的根基。王开玺《从李毓昌案看嘉庆朝的吏治》(《历史档案》2002 年第 4 期) 通过李毓昌查赈被害案管窥嘉庆朝吏治的腐败。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 与坦博拉火山喷发》(《复旦学报(哲社版)》, 2005 年第 1 期) 从气候变化角度揭示嘉庆朝云南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张颖华《道光年间江苏省的赈务研究——兼与湘省的赈务比较》(《长沙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1 期) 通过清廷对江苏和湖南两省赈务的比较, 揭示道光时期官方的行政管理理念和经济思想。刘亚中《汪志伊〈荒政辑要〉所见之荒政思想》(《中国农史》, 2006 年第 4 期) 通过对嘉庆时期较为著名的荒政书《荒政辑要》的探讨, 认为本书在用人、标本兼治等方面体现了一系列积极的荒政思想。杨松水、朱定秀、孙玮《从嘉庆甲戌年皖中旱灾赈济看清代社会救助的特点》(《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7 年第 3 期) 通过对安徽旱灾的研究, 认为嘉庆时期社会救助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型。和卫国《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

——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从安辑灾民和稳定社会角度对嘉庆时期政府的应对策略进行探讨。李伯重《“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以道光三年（1823年）松江地区水灾为例，具体地考察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有些学者也关注到了嘉道时期相关历史人物的救灾活动。如陶用舒《陶澍对苏、皖水灾的处理》（《镇江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分析了陶澍在苏、皖任职期间的救灾活动。王卫平、顾国梅《林则徐的荒政思想与实践——以江苏省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认为，在清代荒政日渐废弛的情况下，林则徐的荒政活动却卓有成效。林则徐的荒政实践是他一生中除抗击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之外的又一个闪光点。另外，如陈德华《林则徐在江苏述评》（《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和陆玉芹《林则徐江苏灾赈述论》（《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对林则徐的荒政思想或实践都有阐述。徐燕《论松筠的经济思想》（《内蒙古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论述了松筠的救荒抚困的经济调节思想。张岩《论包世臣河工思想的近代性》（《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认为包世臣长期致力于南河河工的研究和实践，对当时河工领域的黑暗、腐败提出尖锐批判，于治河方策亦有系统、深入、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在工程技术管理方面讲求规范、注重水学、运用数学语言、讲求劳动效率等，已具有可贵的近代意识和进步意义。

疫病是灾害的重要一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余新忠的文章很有代表性。他的《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将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置于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对疫情及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既使我们看到了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更使我们了解了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有些文章揭示了嘉道时期救灾活动中的弊端。谷文峰、郭文佳《清代荒政弊端初探》（《黄淮学刊》，1992年第4期）指出清代荒政中的弊端，一是社会政治因素导致的弊端，一是救荒政策本身的漏洞，并认为从总体上看，清代前期执行的比较认真，道光以后，荒政弊端丛生，有名无实。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认为清代政府对黄河的治理高度重视，但是在腐败的河政体制下，河防工程每况愈下。余新忠、杭黎方《道光前期江苏的荒政积弊及其整治》（《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就某一具有鲜明特点的时段和

地域作了细致研究,认为这期间官方赈济是富有成效的,但也显现出众多的弊端。韩晓《道光十一年苏皖救灾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本次救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暴露了吏治腐败对晚清荒政的影响。

有些文章则从民间角度对赈济进行了研究。吴滔的《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很有代表性,文中提出从乾隆晚期到嘉道时期,随着国家荒政体系的逐渐衰败,社区赈济民间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余新忠《道光三年苏州大水及各方面之救济——道光时期国家、官府和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1999年)以道光三年苏州水灾为例,通过对国家、官府和社会救灾活动的分析,指出国家救灾手段的经济化和乡赈的社区化是道光时期灾赈的两大趋向。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然而,从总体上看,有关嘉道时期灾荒的研究仍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专著尚无,论文数量相对很少。而且它们或着重于某个人物救灾活动的分析,或对某一种类的灾害进行分析,或就某一场灾害进行探讨,失之零散或笼统,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书拟将嘉道时期作为一个整体,从研究相对薄弱的灾荒切入社会,在尽量多的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嘉道时期灾荒的成因、灾荒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灾荒的特点,以及清政府为主导,整个社会救治灾荒的举措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目 录

序 言	李文海(1)
绪 论	(1)
第一章 嘉道时期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嘉道中衰	(1)
一、吏治全面败坏	(1)
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6)
三、财政拮据严重	(8)
四、社会危机四伏	(11)
第二节 有心求治,无力回天	(14)
第二章 嘉道时期的六大灾荒	
第一节 嘉庆六年(1801年)永定河决口	(23)
第二节 嘉庆十八年(1813年)冀鲁豫三省旱灾	(26)
第三节 道光三年(1823年)北方京畿直隶、南方苏浙皖等省 大水灾	(28)
第四节 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	(34)
第五节 道光二十六、二十七年(1846—1847年)秦豫大旱	(38)
第六节 道光末年的东南各省大水灾	(41)
第七节 其他	(46)
第三章 嘉道时期灾因探析	
第一节 自然原因	(55)

第二节 社会原因	(58)
一、嘉道时期人类不当的生产活动与灾荒	(59)
二、政治腐败与灾荒	(66)
三、战争与灾荒	(68)

第四章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农民起义

第一节 自然灾害促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72)
第二节 灾荒引发农民起义	(76)
第三节 嘉道时期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防范和对策	(79)
第四节 灾荒对战争的影响	(80)
一、广大贫苦人民尤其是灾民壮大了起义队伍	(80)
二、粮食补给对作战双方的影响	(81)
三、自然灾害对作战双方的影响	(83)
第五节 战争对救灾的影响	(85)

第五章 嘉道时期政府的荒政举措

第一节 防灾备荒措施	(93)
一、重农备荒	(94)
二、仓储备荒	(99)
三、兴水利备荒	(108)
四、治河	(113)
第二节 报灾、勘灾与查赈	(124)
一、报灾与匿灾、捏灾	(124)
二、勘灾与勘灾不实	(126)
三、查赈	(127)
第三节 救灾措施	(129)
一、蠲缓	(130)
二、赈济	(132)
三、调粟	(137)
四、借贷	(139)

五、安辑流民	(140)
--------------	-------

第六章 嘉道时期的民间赈济

第一节 政府救灾能力的下降	(158)
---------------------	-------

第二节 政府对民间赈济的倡导	(161)
----------------------	-------

第三节 民间赈济的状况	(164)
-------------------	-------

一、民间赈济力量组成	(164)
------------------	-------

二、民间赈济形式	(165)
----------------	-------

三、民间赈济的地域范围	(168)
-------------------	-------

四、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的形式	(170)
---------------------	-------

第四节 民间赈济的地位和作用	(171)
----------------------	-------

主要参考文献	(177)
--------------	-------

后 记	(189)
-----------	-------